

吐鲁番“洋车”的传入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基于民国档案的分析

贾丝婷 张莉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民国时期吐鲁番档案中经常出现“洋车”一词,与棉花加工业有关,或因资料限制,前人还未有专门的讨论。本文利用新近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吐鲁番档案,揭示了近代吐鲁番的“洋车”系水力驱动的轧花机,光绪末年在吐俄棉花贸易兴盛的背景下由俄国传入。民国时期吐鲁番的“洋车”以工厂的方式进行经营,随之出现新的劳动组织模式,不但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体现了近代西北边疆的社会经济转型与相邻的俄(苏)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洋车”;民国档案;吐鲁番;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3-0091-08

“Yangche” and it’s Socio-economic Impact in Turpan

——A Study Based on the Republican Archives

JIA Si-ting ZHANG Li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Abstract: The term "Yangche" frequently appeared in the republican archives of Turpan, it related to cotton processing. Maybe due to lack of materials, there has been no academic study about it. Using recently released republican archives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rchiv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modern "Yangche" in Turpan was a cotton gin driven by hydraulic. It was introduced from Rus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lourishing cotton trade between Turpan and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urpan's "Yangche" in Republic period operated as the way of factory, formed a new model of labor organization.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cotton processing efficiency, but also reflected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west frontier region and its neighboring Russia (Soviet un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rn time.

Keywords: "Yangche"; republican archives; Turpan; social economy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吐鲁番档案中,频繁出现“洋车”一词。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洋车”一般指的是由日本传入的人力两轮车^①。但是通过对相关档案搜集和分析,笔者发现,民国时期吐鲁番的“洋车”与交通工具无关,而与棉花生产有关。在一则档案中提到,“小的在头工庄置有坎水

【收稿日期】 2020-04-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17JJD770012)、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清代以来新疆屯垦及其效应研究”(19VXJ013)

【作者简介】 贾丝婷(1996-),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史;张莉(1976-),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环境变迁与区域历史地理。

① 张定亚:《简明中外民俗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地亩,自置界内安设冬水洋机车一座,每日能拧棉花三百余斤”^①。这里的“拧棉花”就是指使用拧花机将棉籽挤出获得皮棉,也就是轧花的过程。可见,吐鲁番“洋车”应该是一种水力驱动的轧花机,它们的功能是将籽棉分成皮棉和棉籽两部分。更多地翻检资料,笔者发现档案中记载的几个名词“水力拧花机”“水力棉机”“洋机”等都是指“洋车”,只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洋车”来表达。

近代以来,中国棉业技术的改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式轧花机生产力高,市场竞争力强,弥补了传统的手工或木机剥制棉花生产量低、不能满足纱厂及出口需求的缺陷^②。另一方面,新式轧花机的推广使用,进一步推动了棉花生产的商品化,从而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向社会的劳动分工的转变^③。与此同时,与棉花有关的国内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的管理制度、劳动纪律和生产组织方式的产生^④,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基本不涉及边疆地区。要全面地了解棉业技术变革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能忽视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此外,以往棉业技术变革的研究更加侧重于纺织业技术的变革,轧棉作为棉花加工的第一步,其相关机械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的一批吐鲁番民国档案,以“洋车”为切入点,探究民国时期吐鲁番的轧花技术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以管窥解近代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变化之一斑。

一、“洋车”的工作原理及传入

民国时期的轧花机有太仓式、皮辊式、锯齿式等不同类型,由人力、畜力、水力以及蒸汽机等几种动力驱动^⑤。民国吐鲁番地区的“洋车”属于什么类型,其工作原理如何?这些是首先要理清的问题。

一则档案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吐鲁番城内的八社寺打算开设“洋机车”,但缺乏“铁轴”“皮条”等零件^⑥。这两种部件与近代文献中记载的皮辊式轧花机之“曲轴”“皮辊”相吻合,说明民国时期吐鲁番的“洋车”应该属于皮辊式轧花机。民国时期中国东部的轧花机主要依靠人力驱动^⑦,而根据档案记录,吐鲁番的“轧花洋机”都是由“水力打轮旋转”^⑧。综上可知,民国时期吐鲁番档案中出现的“洋车”是一种以水力驱动的皮辊式轧花机。

在干旱少雨的吐鲁番地区,巧妙地利用地势高差,疏导河水或者坎儿井水进行水力驱动轧花机运转,可以极大地提高前电力时代棉花加工的效率。结合档案史料记载以及实地访谈和调查,本文尝试复原“洋车”的运转方式。一般来讲,放置轧花机的木屋为两层,上层为轧花机主体,底层为水轮;木屋修建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头工户民于思永阿吉为开设洋车一案的禀》(1917年),档案号:M16.016.YJ.1264。

本文所用民国档案获取自“中国开放档案共享平台”(www.archives.gov.cn),查阅时间为2018年5月至2019年12月。

②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66年,第170-171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8-347页;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④ 王翔:《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4-559页;高超群:《从“商”到“实业”: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的观念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⑤ 赵文榜:《中国近代轧棉业的发展》,《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省长兼督军公署就杨知事擅将八社寺内洋车零件取去不还一事给吐鲁番县知事杨沅的训令》(1922年),档案号M16.017.YJ.2523。

⑦ 赵文榜:《中国近代轧棉业的发展》,《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民国八年经济调查表》(1920年),档案号:M16.017.YJ.2153。

在有一定地势落差的河道或者渠道附近,由较高处开渠引水,水流至稍低位置的木屋底层(访谈中有老人提到落差有7米左右),冲动其中的木轮旋转,通过皮带连接木质水轮与轧花机之间的联动,带动位于二层的轧花机转动(见图1)^①。这种轧棉方式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又与更加先进的皮辊式轧花机相结合,推动了民国时期吐鲁番棉花加工业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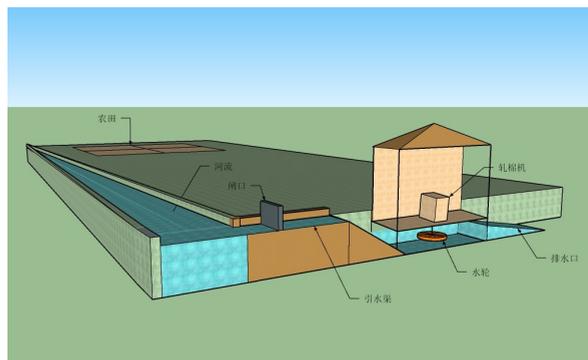


图1 民国时期吐鲁番水力驱动轧花机工作原理复原示意图

既然“洋车”代表了更高效的轧花技术,那么这种技术是如何出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洋”字前缀的词语,表明这些事物都是自外国传入。从名称上看,“洋车”之“洋”也可能有此含义。民国十一年(1922)的一则档案提到,由于当年俄国发生内乱,导致“洋车”零件购买渠道出现中断^②。在另一则档案中则直接讲到这些轧花洋机主要是从俄属斜米省(今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购买而来。此外,民国时期的中外游记中也透露出“洋车”是从俄国传入的相关信息^③。这表明,民国时期吐鲁番的水利轧花机都是自俄国采买而来,甚至零部件都依赖俄国的进口。

至于吐鲁番“洋车”的具体传入时间,文献记载不一。2002年出版的《吐鲁番县志》认为是民国七年(1918),但同时又提到光绪三十年(1904)胜金口曾安设过“轧花洋机”^④。由于该论著缺少注释,无法得知这两个说法的依据。不过,据我们目前检索到的档案来看,民国时期吐鲁番县有11家“洋车”轧花工厂,其中4家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⑤。可见光绪三十二年前后是吐鲁番“洋车”传入和推广的关键时期。

光緒末年,“洋车”从俄国传入吐鲁番,与当时的中俄棉花贸易息息相关。俄国的工业革命率先从棉纺织业开始,1890至1900年间,俄国棉纺织工业部门纱线产量增长96%、纱锭数量增长92%、坯布产量增长了75%、织布机数量增长74%^⑥。随着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原棉的需求量逐渐增多。但俄国中西部莫斯科一带皆不宜种棉^⑦,因此其转而对外开拓原料产地,至1910年中亚及中国新疆提供了俄国所需棉花的44%^⑧。新疆棉花的大量进口,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棉花贸易提高了新疆当地居民购买俄货的消费能力,扩大了俄国商品的销售量;另一方面,新疆棉花的输入可以使俄国摆脱对于美国棉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托农牧场为请修理清花机器室及改造水轮等费由机器租费及年支金结存项下开支的呈及新疆省建设厅的训令》(1940年),档案号:M16.008.YJ.6350。2018年7月24日访谈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乡三位70岁以上的老人。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省长兼督军公署就杨知事擅将八社寺内洋车零件取去不还一事给吐鲁番县知事杨沅的训令》(1922年),档案号M16.017.YJ.2523。

③ [芬]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王家骥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6页。

④ 吐鲁番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吐鲁番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4、54页。

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农商部工厂调查表及新疆吐鲁番县民国十二月的实况》(1923年),档案号M16.004.YJ.2844。

⑥ 白胜杰:《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纺织工业垄断》,《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⑦ 艾沙:《新俄关系述论》,载王正儒、雷晓静主编:《回族历史报刊文选》历史卷2,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3页。

⑧ 张娜:《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花的依赖,获得稳定、充足的棉花来源^①。1900年前后,包括鄯善在内的吐鲁番地区已经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产棉区,产棉数占到新疆产棉总数的40%^②。而在吐鲁番的种植结构中,棉花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粮食作物^③,年产可达300余万斤,其中60%输往俄国^④。由此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刺激和带动了吐鲁番棉花种植与出口贸易的发展。

吐俄棉花贸易的繁荣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为了便于收购棉花,俄商在新疆各地建立了商行、分店,根据棉花的生产季节,或直接派店员,或委托中国商人到各产区去订立收购合同^⑤。吉祥涌商行是俄商在新疆建立的最大的商行^⑥,检索档案可以发现,吉祥涌商行在吐鲁番的主要活动就是收购棉花。该商行通常在棉花收获之前,就已经抢先同吐鲁番民户签订了收购合同,待到棉花收获之际,再依约收讨^⑦。由此可以看出俄国对棉花的需求量之大,以及俄商为扩大棉花采购在吐鲁番地区做出的努力。

吐鲁番当局也积极推动吐俄棉花贸易的发展。在民国初年的一份棉业报告中提到:新疆南北两路产棉量以南路吐鲁番等县最多,但土机土法品质粗劣,已经陆续指令改良^⑧。这一方面表明了地方政府鼓励吐鲁番棉业发展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正是在吐俄棉花贸易繁荣的背景下,新轧花技术的引入才被提上日程。推动轧花技术变革更直接的原因,是棉花贸易对棉花初加工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档案中明确指出,俄商购买的棉花一般是净花,须用机器轧去棉籽然后才能装包进行贸易^⑨。因此要扩大吐俄棉花贸易的交易量,必须提高轧花技术的生产效率和品质。吐俄棉花贸易的繁荣不仅体现在交易量的层面,也转换成为技术改进的动力。

综上所述,“洋车”属皮辊式轧花机,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自俄国传入。20世纪前后,俄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刺激了其对原棉的需求,以吐鲁番为代表的中国新疆地区成为其重要的棉花原料产地。吐鲁番作为商埠的开放、便利的交通、俄商的活动以及吐鲁番当局希望增加棉花贸易收入的态度,都为吐俄棉花贸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供不应求的市场刺激下,吐俄棉花贸易从单一的力图扩大贸易量转向寻求技术革新从而解放生产力的路径,因此更新轧棉技术是拓展棉花贸易的选择。“洋车”传入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吐鲁番棉花种植业和对俄贸易的发展。

二、“洋车”的经营方式

在“洋车”传入之前,吐鲁番地区的轧棉生产主要为个体家庭或家庭作坊的经营方式^⑩,村中几乎每

①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长城以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92-193页。

② 张喜琴:《清末新疆对俄国出口结构和新疆地区农业结构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④ 曾炳燝编:《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商务》,马大正等辑:《新疆乡土志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79页。

⑤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⑥ 邓绍辉:《略论1881-1914年间新俄贸易关系的扩大》,《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吉祥涌洋行俄商夏克尔江具控丁义福等订卖棉花逾期不缴一案的禀,诉呈、讯单等》(1914年),档案号M16.002.YJ.0173。

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省长兼督军公署就详细查明六年度产棉状况及纺织情形呈责汇办事给吐鲁番县的令》(1917年),档案号:M16.003.YJ.1220。

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财政厅就查俄商来此购棉新省良章应由卖主纳税等事的飭》(1915年),档案号M16.002.YJ.0422。

⑩ 刘玉皓:《清代民国时期新疆棉业发展》,《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

个妇女都会轧棉,她们用简易的脚踏式轧棉器来轧棉,这是农闲时才从事的副业^①。清末“洋车”传入之后,推动了吐鲁番地区棉业生产方式的革新。民国八年(1919),吐鲁番县棉花产量为155万斤^②,其中99.7万斤是由“洋车”加工的^③,超过了棉花总产量的60%。而且,这些“洋车”都为工厂所有,同一年的档案提到吐鲁番县除去“土法小车”控制棉花的零星小户,县属各乡都设有轧花洋机厂,共有11处^④。由此可知,“洋车”工厂的出现,促使了吐鲁番地区60%的轧棉生产由个体家庭的生产模式向规模化、机械化的工厂生产模式的转变。

“洋车”工厂是指利用“洋车”进行轧棉生产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固定资本量从4000至7000元不等,包括置办机械和机房的费用,其中每台“洋车”价值大约为1000余元,使用期限大致为15年^⑤。受资本规模的限制,每家工厂一般只拥有1台或2台“洋车”。工厂并非全年运转,一般只在每年九月一日至次年二月底开门营业。这一方面是配合棉花秋季收获的季节,但更主要是为了与春夏的灌溉用水错开,合理分配水资源。

档案中还反映了“洋车”工厂中工人们的相关情况^⑥。根据记录,每台轧花机每日轧净花1000斗,轧净花100斤之工资为3.34元,诸工厂每日轧花斗数及工人工资均相同。民国八年(1919)吐鲁番县的11家“洋车”工厂共有职工及徒弟人数443人,其中男性113人,女性330余人。每家工厂雇工7到12人不等,每厂包制皮花女工30到40余人不等。工人每年做工日数为180天,每日工作时间约8小时。值得注意的是,男工和女工的工资结算方式存在差异,男工按月给资,女工每剥皮花百斗付给工银三角。一般来说,“按月给资”更能保证工资的稳定性。由于性别差异所带来的薪资待遇差别,也反映出民国时期吐鲁番女性走出家门做工仍然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压力。

上文提到的11家“洋车”工厂的信息在档案《吐鲁番县造资民国九年分工厂调查表》中皆有记录^⑦。其中部分“洋车”厂的厂名是其经理人的姓名。这类工厂一般为独资经营,是“洋车”经营方式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轧花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商民开设“洋车”工厂。但独资经营“洋车”工厂,对经营者的经济实力要求较高,产业规模也相对较小。

除了以人名作为厂名的工厂以外,还出现了“同盛合”“同顺和”“全兴德”“德顺祥”等商号的名称,表明这些工厂隶属于商号的经管之下。这些商号一般资金雄厚,业务广泛,例如表中提到的“同盛合”是颇负盛名的津帮“八大家”之一,其“分枝遍南北疆”^⑧,在吐鲁番除了拥有“洋车”轧花工厂之外,还有坎儿井、房屋、土地等多种产业,同时还经营借贷事务^⑨。吐鲁番县政府将部分的公款也存放在同盛合商号之中^⑩。商号经营“洋车”工厂的意义是不一般的。一方面,“洋车”轧花工厂只是这些商号庞大商业网络中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丛刊编辑组:《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29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实业厅呈请统计棉花利用及输出标准经吐鲁番县的训令和吐鲁番县呈报填报棉业的调查表》(1920年),档案号M16.004.YJ.2156。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民国八年经济调查表》(1920年),档案号M16.017.YJ.2153。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民国八年经济调查表》(1920年),档案号M16.017.YJ.2153。

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民国八年经济调查表》(1920年),档案号M16.017.YJ.2153。

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民国八年经济调查表》(1920年),档案号M16.017.YJ.2153。

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造资民国九年分工厂调查表》(1924年),档案号M16.005.YJ.3064。

⑧ 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79页。

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为查同盛合和坎井水通与校场及道路无碍请定发照给新疆省长的呈复及新疆省长兼督军公署的指令》(1928年)、《张俊臣与陶多三生意分伙料理所立之房院地基文约》(1922年)、《同盛和承领四等地基的证明》(1922年)、《阿一许因欠同盛合借贷银两交还所具之甘结》(1922年),档案号M16.006.YJ.3935、M16.004.YJ.2517、M16.018.YJ.3765、M16.004.YJ.2687。

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财政厅就查收吐鲁番县公款存放商号花名清册事给吐鲁番县的批并吐鲁番县的详》(1914年),档案号M16.015.YJ.0547。

的一环;另一方面,商号也为这些工厂提供了强大的资本支撑。

除了专门的轧花工厂以外,棉纺织厂也会购置轧花机械,供棉花加工使用。民国七年(1918),新疆省长杨增新发起创建了“吐鲁番模范纺织工厂”。杨增新振兴纺织业利用了天津传来的足踏机和由苏俄传来的“洋车”^①。在1915至1920年间,“吐鲁番模范纺织工厂”棉花加工(轧花)年产量达到37.35万公斤^②,可见具有官办性质的棉纺织厂中轧棉生产规模之庞大。而且为了给新疆振兴实业创造优惠条件,吐鲁番模范纺织工厂从民国七年创办起,产品不课税^③,这体现出官办工厂在税收方面享受的诸多便利。

此外,俄国企业也尝试在吐鲁番投资设厂,但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反对。民国七年(1918),针对俄国公司开设轧花厂的要求,吐鲁番县知事张馨向迪化道公署提出“内地向不准洋商设厂制货,新省亦无先例,希务婉拒”^④,并得到迪化道尹张键的认同。可见当地政府对于外商设厂的抵制。另一则档案也提到吐鄯两属二十余座轧花机器中仅有二座是俄商所有,而且仍假借本地人的名义^⑤。之所以有此情况,政府除了有保护本国商业,与外商争夺商业利益的目的外,也有方便管理,减少涉外纠纷的考虑。按照档案所说,需要厅长出面才能对俄商所运货物进行稽查,遇到纠纷,还得与俄国领事交涉^⑥。因此,由于政府的干涉阻止,民国时期吐鲁番的轧花厂主要是由国人开办的。

“洋车”工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家庭式的轧花生产方式,促使超过60%的吐棉纳入进“洋车”工厂的加工体系当中,提高了棉业生产的效率,确保了吐俄棉花贸易的稳定发展。档案中记录的11家吐鲁番县“洋车”工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模式,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具备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秩序。并且,在工厂的运作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关系,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体现了轧花业生产性质的转变。“洋车”轧花工厂的出现,进一步反映出了轧棉业利润之丰厚,以及棉业市场的繁荣。

三、“洋车”的社会经济影响

民国时期,吐鲁番地区棉花贸易带来的丰厚利益,驱使棉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事与棉花产业相关的工作。但由于交通、动乱等原因,吐鲁番输往内地的棉花并不太多,而是以俄国为主要的输出对象。时人曾说吐鲁番输往内地的棉花贸易总额,不及对苏俄的十分之一^⑦。“洋车”的引入和推广,弥补了传统轧花技术的缺陷,保证了吐俄棉花贸易的稳定发展。作为新疆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吐鲁番棉产业的繁荣奠定了新俄棉花贸易量不断扩大的基础。20世纪初新疆棉花对俄出口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893年出口额为3617普特,约合11.8万斤,1913年达到5300吨,全1060万斤,增长近90倍^⑧。如此大幅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式轧花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革新。

“洋车”的引入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也对吐鲁番地区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冲

① 罗绍文:《西域钩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② 吐鲁番市课题组编:《百县市社会经济调查·吐鲁番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53-54页。

③ 罗绍文:《西域钩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迪化道公署为希婉拒洋商设厂制货事给吐鲁番的令》(1918年),档案号M16.003.YJ.1403。

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财政厅就查俄商来此购棉新省良章应由卖主纳税等事的飭》(1915年),档案号M16.002.YJ.0422。

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财政厅就查俄商来此购棉新省良章应由卖主纳税等事的飭》(1915年),档案号M16.002.YJ.0422。

⑦ 张觉人:《新疆对外贸易研究》,《边事研究》1934年第1期。

⑧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击。在“洋车”工厂出现之前吐鲁番地区家庭式的轧棉活动,规模较小,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的主要生产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棉花在市场上的流通量。随着棉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对于经营方式、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需求。“洋车”轧花,不仅提高了吐鲁番地区棉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推动了棉花贸易的稳定发展,而且直接促使了利用“洋车”进行生产的轧花工厂的出现。

在前文的讨论当中,可以发现在“洋车”工厂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关系,这种组织形式能够实现轧棉的大规模生产,因此能够满足棉花贸易量不断扩大的需求。民国时期,吐鲁番的“洋车”工厂已经形成了独资经营、商号经营、官办经营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形成了规范化的生产秩序和工作分工,工人的薪资、工作时长都已经有了明确的标准。由于“洋车”工厂需要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也使得一部分人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了工厂做工,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减弱。不仅是男性,许多女性也成为了“洋车”工厂里的一员。由于工厂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支持,一些吐鲁番女性也走出家门,参与到了工厂雇工的生产、生活方式当中,虽然其在工资水平上仍低于男性,但已经可以反映出女性在吐鲁番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洋车”的引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轧棉业的生产方式,也对传统的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水利灌溉方面。吐鲁番地区水资源匮乏,但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因此,灌溉条件直接影响了地亩价值。在这种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新疆的分水制度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农户根据所种田地以时辰计算配水,轮流浇地^①。然而靠水力驱动的“洋车”,其运转必然会对农业用水产生影响。“洋车”开挖新渠会造成下渗损失,进而引发水流流量的减少和流速的减慢。“洋车”的引入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分水规则,而且使得农业用水更加紧张,形成了农业灌溉与“洋车”争水的局面。民国三年(1914)八月,吐鲁番二堡、三堡的农户就因何加不拉擅修“洋车”,产生了分水纠纷^②,直观地反映了水力驱动的“洋车”与农业灌溉用水之间的矛盾。

此外,“洋车”的传入提高了地方财政收入,这一方面体现在“洋车”税的征收方面,另一方面也表现于“洋车”传入之后,棉花贸易拓展所带来的政府税收的增长。“洋车”税的征收显示了其在吐鲁番地方财政中占有一席之地。“新疆省吐鲁番县民国十年度田赋收入统计分表”显示,民国十年(1921)“棉机水课”共征收193元,使用棉机水课票32张^③。此外,从档案中可以发现“洋车”的征税多样而灵活。政府不仅依据产能将“洋车”分为上、中、下三种等级纳税,而且对于因为“水减不能转而歇业”的“洋车”进行免税^④。这些表明“洋车”的征税体系已经比较成熟。“洋车”进入赋税体系表明其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并为地方开辟了新的税源。

“洋车”最直接的功能在于提高生产效率,扩大棉花出口量。随着棉花出口量的增长,关税收入扩大,为新疆政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清代,新疆财政一直依赖于中央户部和内地各省调拨协饷^⑤。进入民国之后,内忧外困,中央政府无暇西顾,“协饷”制度走向终结。《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新疆需要分担四十万两的份额,这对于财政困难的新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⑥。“洋车”从技术上推动了中俄棉花贸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水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1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二三堡户民艾买提等控何加不拉等强霸水磨阻挡公水一案给吐鲁番县的禀》(1914年),档案号M16.015.YJ.0413。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吐鲁番县为报其民国十年度财政统计调查表给新疆省长、新疆财政厅长的呈并清册》(1923年),档案号M16.017.YJ.2767。

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省政府就豁免棉机水课一事给吐鲁番县知事李溶的训令》(无年代),档案号M16.022.YJ.6925。

⑤ 《布政使饶应祺就俄商赴新贸易》(18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藏:《新疆与俄苏贸易:商业贸易档案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2页。

⑥ 赵维玺:《饶应祺主新时期的对俄关系探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时人曾统计新疆历年岁入,关税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三,已经超过了田赋的比例^①。正是在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之上,杨增新、金树仁等新疆最高领导人长期秉持着鼓励对苏贸易的态度。1942年,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以后,给新疆经济带来很大影响,吐鲁番地区的棉花生产一下子减少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到1944年盛世才下台后才逐步有所好转^②。可见苏(俄)作为新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成为了民国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民国时期“洋车”传入后,对地方社会与地方财政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洋车”的传入不仅推动了吐鲁番当地轧棉业的发展,保证了吐俄棉花贸易的顺畅。而且以“洋车”为核心所形成的多种经营方式的轧花工厂,还推动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洋车”所带动的棉花出口贸易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政府的财政危机,是新疆在协约断绝之后自谋出路的选择。

四、结 语

清末民初,在贸易需求的带动下,新疆棉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吐鲁番为代表的广大地区成为了俄国重要的棉花原产基地。吐俄棉花贸易的繁荣为“洋车”的引入和推广提供了契机。“洋车”高效的生产效率使其取代了传统的简易轧棉机和手剥棉籽法,并且快速地融入到了吐鲁番地方生产当中。“洋车”传入之后,同传统轧棉方式一起受到冲击的还有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模式。“洋车”的出现也促使了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对于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洋车”工厂在这种需求下应运而生。从某种程度上讲,“洋车”的出现促进了吐鲁番地区新旧生产体制的转化。除此之外,在厘金裁撤,中央政府无力关照边陲之际,以“洋车”作为技术支撑的吐俄棉花贸易以及“洋车”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吐鲁番财政紧缺的局面,推动了边疆地区地经济转型,维护了边疆社会的稳定。

以往学术界在讨论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时,更多地聚焦于海外贸易带动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其实,地处中国西北边疆的吐鲁番地区,由于临近大国俄(苏),其间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在近代国际贸易局势之下,高质量棉花产地的吐鲁番与俄(苏)之间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沿海”型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沿边”型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在吐鲁番民国档案的基础上,所展现的以“洋车”为核心的棉花加工与棉花贸易,一方面可以看出在近代国际贸易带动之下,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变的地方特性,同时亦展示出新疆的开放性与贸易发展潜力。近代中国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转变的过程与特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赵文榜. 中国近代轧棉业的发展[J]. 中国纺织大学学报, 1994, (3).
- [2] 白胜杰.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纺织工业垄断[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
- [3] 张喜琴. 清末新疆对俄国出口结构和新疆地区农业结构的关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
- [4] 华立. 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5] 厉声.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①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新亚细亚》1934年第2期。

② 齐清顺:《论近代新疆对苏(俄)的基本方针》,铁木尔、毛公宁主编:《新疆研究文论选》,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2-136页。